



讴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熊召政

人的岁月称之为年龄，国之岁月称之为国祚。古人到70岁，被称为古稀，而国到七十，碰到好的朝代，则以中兴誉之。今日，70岁的人再也不是古稀之年了，而70岁的国则愈显朝气。人之龄比起国之祚要短了许多，今日70之人属于壮年，而70之国，则是青春弥漫了。

记录人之岁月，称之为生平，记录国之岁月，则称为春秋。两者都是历史，但人之史与国之史，从其规模与风貌来看，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固然，国之历史是通过人的历史来展现的，但人之杰有千千万万，国只有一个。杜甫《望岳》诗有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中华历史的高峰上，看历朝历代的杰出人物，也只是尽收眼底的众山而已。

之所以说中国历史悠久，乃是因为数千年的历史从未中断，无论有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从不曾被灭国。这一点与地中海文明养育的欧洲有着根本的不同。今日欧洲之英、德、法、意诸国，绝不是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的延续，这两个远古的地中海强国早已灰飞烟灭了，而当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仍是远古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既没有被灭国，也没有被灭种。我们有一个朝代纪年，夏商之后，简略称之为“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只是大的朝代的更替。其实每一个朝代里都有一些分支，有的朝代甚至平行存在几个政权，但这些政权的执政者都认为自己是中国。

我本是一个历史小说作家，阅读史籍，研判史势，探究故实，寻找规律，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必做的功课。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精神。地中海文明的智者冥思苦想“我从哪里来”，中国的智者则秉承“敬天法祖”的旨趣，在“天人合一”中找到适者生存的方法。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便是客观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自信”，便是今日执政党所秉承的“道”。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首先要磨砺辨道的学问，在此基础

上当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遵道者。古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是提醒遵道者辨清每一个时代不同的追求和特质。疑古不化是为执，刻舟求剑是为妄，去执去妄，是求道者最难做到的事，惟其难，才值得我们终生追求。求道的过程，便是学思践悟的过程。判道、证道、遵道、殉道，不离不弃、矢志不渝者，才可称得上是有家国情怀的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漫长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时代演绎过如此澎湃激烈的春秋大义。置身其中，深感火热的生活是难得的不言之教。虽然期间有曲折和反复，有坎坷和艰难，但时代的大方向是奋勇向前而合乎天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民族复兴的伟业，也是亘古未有之史诗。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不是诗人的形容，而是我们的现实。

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改革大业、复兴伟业。讴歌改革，赞美复兴，这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除了立场之外，还需遵循文艺的规律。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宣传品，无论是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还是一部长篇小说，首先都要是艺术品，然后才能鼓舞人、教化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评价当时的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这真是一语中的。时代精彩，可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不够精彩，究其原因离开了生活，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趋势。浮躁如同感冒，是可以流行传染的。如果一个作家定力不足，就会染上这种时症而不能自拔。

改革初年，我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入历史小说领域，我花了10年时间写了一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乃是我深感改革的新形势下，勇于任事的人太少。于是，我找到了开创明万历

新政的铁血宰相张居正，通过他的改革实践，揭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2005年，我又开始关注北宋这段历史，当时之中国，并行有宋、辽、西夏三个政权，尔后大金崛起，只用了11年时间，就灭掉了北宋与辽，从而成为华夏土地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唐与宋都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朝代，但结局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北宋，文化与经济都非常发达，可是却被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打得卸甲丢盔，逃往江南偏安一隅。中国这个中世纪的大三国，先是北宋、辽、西夏，后来是南宋、金、西夏，这一期间诸民族之间演绎的华夏史，比起当年的魏、蜀、吴小三国，其激烈与复杂性都要丰富得多。单从汉人的角度，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会感到不快，甚至加以排斥、诋毁，但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我们就会觉得这段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与思考价值。

从2005年秋天开始搜集资料，2007年秋于长白山起笔，到今年的7月15日，我在鄂尔多斯完成了《大金王朝》四卷本书稿，不知不觉又花去了14年时间。如果说《张居正》的创作初衷源于改革，那么《大金王朝》的创作动力则来源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进程。

通过两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我感悟到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无怪乎古今中外的大作品都是在冷板凳上写出来的。中国历史是由众多的朝代连缀而成的，国、朝、代是连属而层次分明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国不更易，永远是中国，在国之内，改朝换代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政治集团建立一个朝，一个皇帝又开创一个代，一国数朝，一朝数代。研究国、朝、代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在历史小说创作中首先关注的问题。当下之世，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国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让我们虔诚地思接千古，也让我们豪迈地面向未来。

红色血脉流贯笔端

□石 英

我少年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从事机要密码、电报工作。我在正式参军前，即在胶东故乡解放区一面读书，一面投入了义无反顾的革命活动。1947年春，我参加了当时在部分解放区秘密试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随本县支前大军两赴前方支前劳军，经受战火的熏陶和历练。四年前，我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写过一首题为《战争中没有“小孩”》的短诗，就是当时的切身感受。

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就是在战争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党的教育，部队首长、地方干部、农村老党员、老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激励、呵护与期望，那种真诚、纯朴、平等、公正，令人深切感动的情景数十年也未淡化，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在我上初中的那个时候，本乡那一带还在日伪压榨之下，我和我的家庭受尽了财主、恶霸以及恶少们的欺凌，正是八路军军的“信风”吹临，才使我抬起头来看到了光明，获得了新生。这种巨大而鲜明的人生反差，使我心灵中萌生的感恩意识至深，如《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一个夜晚跨越了一个时代》《良性的感觉就是恩》等，都是这些历史记忆与情感经验的诗文记录。“记忆没有距离，良心忠于历史”，这两句痛彻心扉的话我始终铭记于心。

在机要部门忘我的工作就是对革命、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感恩与回报。新中国诞生之初那几年，工作异常忙碌，经常是日夜“连轴转”。过于劳累以至吐血，还不想叫领导看见，自己悄悄用煤灰遮盖，只恐被迫去休养。不是说“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嘛。在那年月，我这种似乎有点幼稚的想法与做法其实很正常。

1956年，我响应当时国务院的号召报考大学，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了5年，弥补了因过小参军而学业不足的缺憾。在中文系，我也开始圆自小喜爱文学的梦，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并出版了三本文学传记，其内容仍与我的红色“基因”有关。由于“基因”，由于阅历，在我此后若干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红色诗文不可能不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共和国六十华诞前夕，我出版了诗集《走向天安门》，力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与意象营造上有新的创造和突破。2012年，我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充，将抗美援朝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英烈壮举纳入文学视野，出版了《石英红诗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前夕，又结集出版了收录70篇散文的《历史的红色纹理》，其中多数篇章为近年来的新作。

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到耄耋之年，数十年间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但回首以往，又觉得对国家 and 人民的回报还很有限。今后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愿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历程同步，老而不凋仍能有所焕发。

“爬格子”的意义

□秦文君

儿童文学的理性和尊严，我们的儿童文学中有很多成功之作，是以趣味带动其他艺术追求的。

儿童文学作家这个职业，大有乐趣。忠于独创，写出东方情怀，写出有意思的文本，还可以看着出版社将它们变成活泼的书。同时，儿童文学作家更有一种无形的责任，需要不断地折腾，在艺术上超越自我，往往会一个人关在封闭的小屋子里，面对一堵墙，孜孜不倦地写作。有了这一份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才能抵抗寂寞和惰性，才能无惧诱惑，拥有定力。

努力在儿童文学艺术领域跋山涉水的、向往写出精品力作的作家，无疑

阅读和创作文学作品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写作，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愉悦。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阅读，《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李自成》《金光大道》等经典文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而这些记忆无疑是我怀揣文学理想和追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源泉。我从事写作算起来有30年了，白话文写作发展到今天，技术问题早已不是问题，随便谈及哪一位作家，似乎都各有所长，但这正说明了当下的文学“有高原，缺高峰”，换言之，就是没有文学大师。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无疑是文学大国，几千年来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文学高峰。

我个人的创作生涯中，诗歌、散文、小说、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等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有涉猎，创作总量约达500余万字，电视剧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但最令我满意的还是短篇小说。我更希望自己能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尤其是擅长于短篇小说的作家。我更看重文学写作的精神追求，于我而言，这种追求是一定要坚守的。

在还没有完全弄懂小说为何物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仿佛一个男人还不了解女子，便猴急地结了婚。那时候以为小说很简单，短篇更不在话下，随便一写就会发表，或者一不小心就会因此出名改变命运。接连几封退稿信告诉我，小说不是那么好写的。失败的滋味当然还铭心刻骨，但就像历史总愿意书写好的一面那样，我也愿意回忆写作之初的美好冲动。夜深人静了，身体总憋着一股劲，或者说一口气，它需要倾吐出来，释放在稿纸上。吐这口气不需要太长时间，只一个晚上，也不需要太多的笔墨，只20页300格的稿纸。这便是我心目中的短篇小说。

据我的经验，短篇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快乐的形式。首先它的篇幅短小，不需要太耗体力，在兴奋点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所以常常给人以饱满、激动和完美的印象。其次它是自由的，任何一个刹那的想法，都可以变成短篇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被读者接受之后，短篇小说更是获得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极大自由。再次是它能给人以成就感，无论长短，它毕竟是小说，况且世界上还有几位赫赫有名的短篇大师作为榜样。于是乎我这样的懒汉，终于找到了借口，在没有写出大部头之前，无端便有了良好的感觉。如果说我在写长篇或者中篇的时候倍感痛苦和劳累，在写短篇的大部分时间里却感到轻松和快乐。

在阅读人群和阅读时间都越来越少的今天，短篇显得尤其适合，它就像小说的浓缩液，能最大程度地去掉废话，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读者以小说的全部享受。所以，我认为短篇不仅是一口气写完的，它还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

除却短篇的形式之外，地域文化的内容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养分。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是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几千年来，许多伟大的作家作品与其传播的地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依然闪耀着熠熠光辉。我本人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贵州的文学创作，是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几十年以来代表了贵州文学的最高水平。就我个人的创作经验而言，在贵州题材中我比较偏重于出生地黔东铜仁市。贵州府志曾这样赞誉铜仁：“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贵州建省仅六百年，铜仁府原隶属于湖广行省的武陵郡与黔中郡，属楚文化范畴。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是一种必然。如果要举例的话，短篇小说《短河》《藏狗》《村长唐三草》，中篇小说《白多黑少》《水晶山谷》便是楚味的代表。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言之，母亲的文化性格关系到儿子的品质，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了文学的味觉。

我希望因为内心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去“爬格子”。“爬格子”是忠于独创的，严谨而艰难，也是坚持自我，让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中国儿童带来优质的文学作品。

我与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融于魂灵

□杨少衡

我是当年所谓“生在红旗下”那辈人中的一个，虽不是共和国同龄人，却也差不多可称与共和国同行。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都是新中国文学70年岁月的历史见证者。

1979年的时候，我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转眼又过去40年。这40年里，除了从我工作、生活的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见证了当代文学的发展之外，还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参与了这一历程。为此我倍感荣幸，但最难忘却的还是新中国文学早年的蓬勃给我的滋养。

记得自己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算来是在1962年，我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这部长篇小说首发于1954年，1956年由该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其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风靡全国。有一天我在小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本书，向管理员提出借阅。管理员看我个子小，听说只是二年级鼻涕虫，他面露怀疑，问我能看得懂吗？我坚称自己可以。管理员告诉我，按照规定，必须在一星期内还回这本书。我表示没有问题，终于为自己借到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记得那本书似乎有近600页，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每天能读100页，就肯定能把书读完。于是便按这个目标努力。当时我认识的汉字或许还不上千，这本长篇小说里的生字很多，于我好比一个个坑，掉下去就上不来。我采取迂回方式，遇坑则绕，或者凭上下文去硬猜其意，跌跌撞撞，坑坑洼洼，居然在规定时间内把整本书啃了下来，读出了意思，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有成就感，比看电影还带劲。这次阅读除了让我格外钦佩那些能在奔驰的火车上飞身上下的八路军英雄好汉，朦朦胧胧还初步有了某种民族国家意识。这部长篇小说还让我从此记住了一个名词，那就是“作者”。此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通常会有的阅读经历，读过一些童话书、小人书和儿童杂志。无论读什么，我都是一下子陷入故事，从来无视作者署名，不在意故事是谁写的。直到读这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依然还是这种习惯。当时我到处向人宣布自己读过《铁道游击队》，不是小人书，是大本书。有一个大人问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后来我特地到学校图书馆再去找那本书，从此记住了“刘知侠”三个字，也知道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作者，他应当和他写的故事一起被记住。

这本书开启了我的长篇小说阅读之旅。不久以后，我又找到了一个比图书馆更方便、快捷、宽容的小说阅读渠道。我到一位同学家里玩，意外发现他家的书柜里竟有众多长篇小说，一本本排了几书架。《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等，听说过的书应有尽有。同学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掌门人，似乎没听说他喜欢看小说，他有两儿一女，或许他买这些书是想让他们去读，期待未来家里也出个作家？相比起来，我父亲也有一个大书柜，书也很多，主要是政治理论类，文学书也不少，基本上是历代诗词，当时我不感兴趣。我的同学和他父母、兄妹都非常慷慨，允许我将他们家的书柜视同己有，随时可以拿书，没还回来也从不错讨。短短一两年，那书柜几乎被我搬空，其中有许多被我读过之后又拿去与其他同学换书读，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直至不知所终。后来每想起这些，我心里还很内疚，同时又非常感激，因为我几乎借此读尽了当时出版的最好的那一批中国当代小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新中国文学七十年早期的那些经典之作。

随着时代与生活的变迁和自己写作经验的积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读了古今中外很多小说，阅读面得以拓展，才敢自称有所见证。有趣的是，尽管后来读得多，有不少体会，会为新鲜的表现拍手，为独到的作品折服，有所领悟也有所借鉴，但是平心而论，对我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少年时就深深铭刻于心的那些作品、人物和故事理念。以至于如今自己写小说时还会突然发现，笔下某个人物似乎有记忆中某个小说人物的影子，环境虽大不相同，气质与精神却相通。我把这理解为时代与人生的烙印，亦是新中国文学经典给我的滋养，早已悄然融于魂灵。

母亲的文化性格决定儿子的品质

□欧阳黔森